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变革、 政治效能与基本经验

方 雷 黄硕明 周 昊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领导国家建设实现发展前途转换、发展道路转变、发展体制转轨和发展方式转变,成功走出一条以政党领导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对政党地位与功能的狭隘理解,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价值凝聚效能、权威塑造效能和组织动员效能。在党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自觉组织变革、坚持党的自主理论创新、坚持党的政策创新试验等基本经验。这些经验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发展,并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国家建设; 现代化; 政治效能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3.03.002

国家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迈向现代化的社会,“都面临着建设和发展现代国家、使现代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有效成长的历史任务”^①。与此同时,尽管现代化是各国发展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是各国国家建设的历程、模式、机制却不尽相同。因此,国家建设本质上体现着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独特性。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主体,党的领导贯穿于国家建设始终,既决定着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实践进路,又塑造着以政党领导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新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②在此意义上,要系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就应从学理上把握政党领导与国家建设的内在关联,总结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变革、政治效能与基本经验,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发展,并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提供参考。

一、政党领导与国家建设

长期以来,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是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条主流路径,“二者分别侧重社会和国家作为主导性力量来推动整体性现代化进程”^③。然而,这两条路径虽然为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并长期主导其政治发展研究,但二者却忽略了政党“作为一种跨越了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性力量的重要作用”^④,更未能对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具有充分认知。因此,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党加强基层政治建设的实践与经验研究”(22ZDA033)。

作者简介: 方雷,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院长,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岛 266237; fanglei@sdu.edu.cn); 黄硕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岛 266237; 254468767@qq.com); 周昊,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岛 266237; 977716166@qq.com)。

① 林尚立:《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③ 张伟:《作为主导现代化进程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④ 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当一些效仿西方道路的亚非拉国家遭遇现代化转型失败,而另外一些以中国为代表的依靠政党领导的后发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并反思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

首先,从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后发国家的政党并不仅仅是“社会”与“国家”之外的制度补充力量,而是贯穿于国家建构与国家建设这一长期历史过程的关键领导主体。当代政治发展研究表明,“国家建构(state making, state construction)优先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前者解决国家基本结构的搭建,后者优化国家诸要素的匹配方式”^①。这意味着,研究现代国家建设须将研究视野扩延至国家建构这一前提阶段。在此基础上,比较各国现代化历史可以发现,政党在国家建设中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而言,西方政党产生于民族国家诞生之后,作为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中介组织,西方政党主要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中代表、表达公民的利益要求以及组织政治参与。显然,这种国家建构中的“主体缺位”或民主框架下的“辅助性质”,都决定了西方政党无法获得与“国家”或“社会”相平行的结构性地位。相比之下,在诸多后发国家,政党的建立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并且由于“传统的国家与软弱的社会力量难以承建国家建构的任务”^②,后发国家的政党反而成为组织社会、重建国家的主导主体。即使在完成国家建构以后,后发国家的政党也继续担负领导国家建设、推进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长期职责。由此可见,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往往是领导国家建设的关键主体。

其次,从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功能来看,区别于西方先发国家强调政党的代议、表达或选举功能,后发国家更侧重于政党在“启动、管理和巩固动态的政治变化和发展方面的潜在作用”^③。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无论是传统政治秩序的变革重建(国家建构),还是现代政治秩序的改革调适(国家建设),剧烈的秩序变动必然伴随着矛盾与社会震荡。这无疑对领导国家建设的政党提出了极高要求:一方面,在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阶段,政党需要在外部斗争中为国家争得独立的主权地位,在内部统治中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在政治秩序的调适与稳定阶段,政党则要担负起领导国家建设的长期职责,确保政治稳定与经济动态平衡。前者规定了政党必须具备严密的组织性、强大的动员力和彻底的革命性,后者规定了政党必须具备超强的使命感和与时俱进的适应性。因此,根据一些后发国家的成功经验,一个强大的领导型政党实际上应具备价值凝聚、权威塑造和组织动员等功能。这些功能赋予政党以更高的权威性、适应性、内聚力和动员力,从而使其能够在创建政权、整合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等国家建设活动中,始终具有维持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领导能力。

综上所述,政党领导与国家建设之间存在深刻、复杂而紧密的理论和现实关联。相对于西方先发国家强调“国家”与“社会”对国家建设的主导推动作用,政党领导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路径实际上更符合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需求。只是仍需指出,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其特定的意义结构和发展变迁的适当性逻辑。各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历史运动的轨迹取决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态条件的结构性制约”^④,即使是相似的发展路径或发展模式也往往具有不同的前途命运。例如,从法国和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来看,二者均是政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典型代表,然而其发展结果截然不同。法国模式在发挥短暂的作用之后,雅各宾派就因“热月政变”被推翻,在“雾月政变”中回归到传统的专制主义^⑤。与之相对照,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实践道路,成功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可见,规范而有效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固然重要,但成功践行相应理论的现实经验更加难能可贵。基于此,本文

① 任剑涛:《国家建构、国家建设与行政国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

② 赵娟娟:《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导源、历史形成和现实意义》,《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③ La Palombara J., Weiner M.,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SPD-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5.

④ 唐皇凤:《政党主导型现代国家建设: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历史逻辑的阐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⑤ 张翔:《在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政党中心主义的起源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以下部分将考察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变革、政治效能,并总结其基本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变革

近代以来,面对传统帝制的崩解和列强环伺的威胁,中国在整体性民族危机的形势下被迫开启现代化进程,试图以现代国家要素改造传统政治秩序,进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各阶段,有力地推动国家建设实现了发展前途转换、发展道路转变、发展体制转轨和发展方式转变,呈现出一幅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

(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国家实现发展前途转换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启了以民主共和为取向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然而,孙中山先生“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建设方略……并没能把中国带入现代国家”^①。面对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通过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立新中国,实现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发展前途转换。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将“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②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系列艰难、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与道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各阶级状况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分析,党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与此同时,党高度重视政党品质与政党组织体系建设。依托思想建党、群众路线、党内整风教育、自我批评等手段,保持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通过在党内实施民主集中制,有力强化了党组织的严密性与凝聚力。借助这一严密的组织体系,中国共产党将分散的国家建设力量迅速聚集起来,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③。按照毛泽东的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④。在此意义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既在革命逻辑上为中国国家建设保持了社会主义指向,又在现代化逻辑上为其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前途。

(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国家实现发展道路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严峻的社会政治形势以及百废待兴的经济生产形势,党通过对政治秩序的创设构建、社会秩序的整合再造、经济生产的恢复发展,为现代国家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基本制度基础,实现了国家发展道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首先,在政治秩序创设方面,党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为党和国家的统一治理,确立了正式的国家制度框架。在此框架基础上,党领导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其次,在社会秩序重建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党内建设与党外建设两个层面出发,一方面,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锻造提升全党

① 张浩:《国家构建与政党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员干部的执政领导能力;另一方面,党不断拓展、延伸各级党组织网络,发动持续、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既有效“摧毁了社会各领域残存的同国家意志相抵触的各种旧的社会力量”^①,又实现了社会秩序的整合、重建与再造。再次,在经济生产的恢复发展方面,党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的八大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基础上,正确判断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②。基于此,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成为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目标。最终,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进而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大步迈进。

(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国家实现发展体制转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从此告别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时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国家建设继续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下,逐步实现了发展体制转轨。

在这一时期,党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正确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期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不仅有效破除了“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是不相容的”这一错误看法,而且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二者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党的十二大提出“关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④;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⑤;党的十三大高度评价“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⑥;党的十四大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针对该目标的具体实现,作出了全面战略部署,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至党的十六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随后党领导人民继续锐意进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国家发展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⑦。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国家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判断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① 何显明:《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及其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意志聚合与实现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④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第1版。

⑤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1日,第1版。

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61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展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并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应当以何种发展方式引领新时代的国家建设就成为一个内在议题。从历史来看,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长期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虽有其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但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日渐凸显,这迫切要求国家发展方式向更加注重全面性、系统性和协调性转变。

为此,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先导,以发展理念创新为指引,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体系为保障,着力推动国家发展方式转变。首先,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全方位建设,有力确保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了党对国家建设的领导权威和领导能力。其次,在发展理念创新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③的新发展理念,致力于系统推进发展动力的创新、发展关系的协调、发展模式的绿色、发展空间的开放与发展成果的共享,为新时代国家建设架构起规范的价值理念体系。再次,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科学的规划部署,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④,为国家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⑤,随着党领导国家建设向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拥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政治效能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变革历程,党能够从边缘性政治力量成长为国家建设的领导主体,并成功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究其原因,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承载着凝聚社会、组织秩序、建设国家的历史使命”^⑥,使命型政党的性质使其领导能力和领导功能远超西方政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将自身的领导能力和领导功能有效转化为价值凝聚效能、权威塑造效能和组织动员效能,从而满足了国家建设对权威、秩序和广泛支持力量的需求。

(一)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价值凝聚效能

价值凝聚是政党作为政治实践的组织和行动者所具有的基本功能。但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政党的价值凝聚功能只有转化为价值凝聚效能,才能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凝聚集体力量、组织集体行动。因此,这一效能转化过程内在地要求政党确立和宣扬具有高度共识性的价值理念。一方面,政党价值理念的确立能够加强政党的组织内聚力,团结党内成员,塑造严密的政党组织体系;另一方面,政党依靠价值理念的宣扬可以将分散的社会成员整合起来,形成民族、国家层面的共识认同。在此基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1版。

④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⑥ 曾毅:《党领导国家建设:中国特色政党理论的元命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7日,第7版。

基础上,由政党扩散至阶级、民族和国家范围内的价值凝聚效能才得以最终形成。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核心,在建党之初就高度重视党的价值理念的建构与宣扬。就价值理念的建构而言,中国共产党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以民族复兴为使命”的价值指向,决定了党的价值理念体系具有远高于其他政党的共识凝聚力。就价值理念的宣扬而言,中国共产党注重将自身的价值纲领内化于党员内心之中,外化于各级党组织、党员个人的行动之上;强调以实际行动彰显、传递党的价值理念,进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认同与拥护。在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即是通过高扬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领导国家建设的各个阶段,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价值理念、宗旨原则,将党的根基立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之中,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强大的价值凝聚效能。

(二)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权威塑造效能

当代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表明,权威与秩序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政党则是塑造权威与秩序的关键政治力量。“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①。这意味着,在以政党为主导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国家公共权威与秩序的塑造应以政党自身权威的塑造为起点:第一步是组建强大的政党、塑造政党权威;第二步是由该政党主持构建代表公共权威的合法政权。而这一双重权威(政党权威与国家公共权威)的塑造过程,则体现着政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权威塑造效能。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就自觉地将组建党的组织、树立党的权威摆在优先地位。通过建立严密的党组织体系、明确党的政策纲领、建立党的制度规则,中国共产党将自身打造成一个纪律严明、目标明确、具有强大权威的使命型政党。在革命斗争中,党正是凭借自身强大的政党权威,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方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革命集体力量。随着领导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党的权威也在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下不断巩固和强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现代国家政权,不仅为新国家塑造了合法的公共权威系统,而且也使党从革命领导党转变成为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始终拥有坚强的权威领导主体和稳定的政治发展秩序,这充分展现了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权威塑造效能。

(三)党领导国家建设的组织动员效能

组织动员是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不同的政党体制具有不同的组织动员能力,这进而决定了不同的政党在国家建设中会显示出差异极大的组织动员效能。一般而言,相较于组织松散、支持力量较弱的政党,一个拥有广泛支持力量和严密组织体系的政党,往往具有更为显著的组织动员效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建设的百年历程中,就充分展现了强大的组织动员效能。自建党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动员工作,善于整合党的组织力量,发挥党的组织凝聚力。“每一位党员都是一位战士,每一个支部都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以党员和党支部为中心向外辐射,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其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②,为国家建设提供支持力量。在革命斗争时期,党的组织动员功能与群众路线相互促进,通过以土地改革为内容的经济动员、以政治参与为手段的政治动员和以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内容的文化动员,我们党成功发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争取民族独立、构建现代国家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延续组织动员传统,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迅速组建党的组织体系,将党组织体系的覆盖范围扩展到全国,不仅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坚固连接,而且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形成了高度认同与支持。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建设

①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沈宗美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1页。

② 陈松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能力建设的主要经验》,《国家治理》2022年第21期。

工作继续深入推进,不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体系,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推动党的组织更加广泛地嵌入现代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结构之中,塑造出更为系统、庞大的党组织动员网络。依靠这一网络,中国共产党不仅极大提升了自身的组织动员能力,而且重塑了基层治理体系,将党的组织动员效能进一步释放。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变革和政治效能的分析,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自觉组织变革、坚持党的自主理论创新和坚持党的政策创新试验。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对于中国而言,应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遵循;对于世界而言,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有益参考。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国家建设维持稳定秩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这一经验事实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导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在党领导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见证了党的建立与发展的伟大历程,见证了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现实行动,切实感受到党与自身命运、党与国家命运的息息相关。这种由深厚的历史体验所塑造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使得坚持党的领导成为一种深植于人民内心的自觉原则。历史与现实均表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维持政治稳定、促进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原因。首先,党始终代表和维护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党员干部,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而是始终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全体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根本宗旨和原则。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这种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和无私性,无疑能够有效疏导诸多团体的利益矛盾,避免政治参与无序化造成的混乱,从而维持政治稳定。其次,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政治体制具有高度韧性的关键因素。在该体制中,党员干部基本嵌入到政府体制之内并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党的组织和党员遍及社会各行各业,形成了庞大而系统的组织网络,整个社会被凝聚在党的周围。这种“政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结构,能够有效维持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秩序。就此而言,在新时代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党领导国家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秩序保障。

(二)坚持党的自觉组织变革,为国家建设巩固领导权威

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作为领导主体的政党往往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权威弱化挑战。特别是对于使命型政党而言,一旦政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受到侵蚀,政党的权威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应对这一挑战的基本经验是: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原则基础上,通过党的自觉组织变革进行自我革命,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推动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进而有效巩固党的领导权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党与国家这两个关键主体。国家发展是党领导人民致力追求的现代化目标,而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也内在要求党能够与时俱进,能够适应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实际上内含着两个主体的现代化任务,即政党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党的自觉组织变革正是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纯洁性,实现自身现代化并进而领导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建党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始终将先进性与纯洁性要求贯穿于党的性质、宗旨与组织建设之中,体现在各级党员干部的教育学习和实际行动上。这不仅有效巩固了党的领导权威,还使党的组织体系更具开放性和适应性,赋予党持久的生命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党的自觉组织变革显得越来越重要。持续的自觉组织变革在赋予党自我革命勇气的同时,也

以开放性和适应性的政党特质推动了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使其能够面向世界,汲取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党的优秀经验,针对国家建设的现实要求作出灵活性调整与应对。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党必须坚持自觉组织变革,永葆党的生命力,永固党的领导权威。

(三)坚持党的自主理论创新,为国家建设提供思想指引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中从未放弃独立自主的理论创新精神,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会通中西、兼收并蓄”的基本立场,在尊重本国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他国的合理经验,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事实上,一个国家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往往与该国的历史文化、国家规模、社会性质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各国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并没有一个完美的模板可以复制,这就要求领导国家建设的主体力量必须具备理论创新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理论创新精神密切相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由此,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创新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立自主的理论创新特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擘画了发展蓝图。这是我们党独立自主进行理论创新的又一成果证明,它体现了党在新时代对自主理论创新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四)坚持党的政策创新实验,为国家建设探索可行方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转向发展建设阶段,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不仅显示了党领导国家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供给能力,同时也展现了我们党强大的政策供给能力。政策供给能力的基础是党的政策创新试验,这是党领导国家和治理国家所采用的一种独特的政策试点、创新与优化机制,该机制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党在革命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实践。有研究指出,“1949年以前,在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土改试验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在中央指导下经过精心设计的政策实验的方法”^①。这种方法主要采取由点及面的实验主义路径,首先在局部地区进行政策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再在全国层面推广。该机制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科学可行的政策实践方案。目前,在党的领导下,政策创新实验已经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自主探索”、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设计实验”和介于二者之间的“请示授权”三种途径^②。这三种途径既兼顾了中央顶层设计的宏观优势,又发挥了地方自主探索的政策创新优势,将党的思想理论与国家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在新时代,应继续坚持党的政策创新试验方法,为国家建设探索可行的政策方案。

五、结语

综合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百年变革之路,是以政党为中心、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新范式在现实中的成功实现。它既超越了西方“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对政党功能的“狭隘理解”,让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功能作用,同时也揭示了现代化的目标普遍性、道路多样性以及各国国情的特殊性。西方先发国家基于自身经验而总结、抽象出的现代化发展范式,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化模板。在此意义上,我们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变革过程与政治效能转化机理,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后发大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一次经典示范。未来,随着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会不断发展,

^① 韩博天:《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郁建兴、黄飏:《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兼论纵向政府间关系的重构》,《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中国人民将倍加珍惜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不输出现代化“标准模式”的前提下,为世界现代化的实践推进和理论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

The Historical Changes, Political Efficacy and Fundamental Experience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tate Building

Fang Lei Huang Shuoming Zhou H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P.R.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China's modern state building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modernization. As the leadership cor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a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ioneer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history of humanity. This modernization path that relies on the leadership of political parties is beyond the confi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it reveals that the political parties take dominant position and have crucial function in state building, which has been underestimated. In particular, since World War II,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following the western model have encountered failures of their modernization during its transformation.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irst present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PC in state building by reviewing the major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state building led by the CPC.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fficacy, it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the CPC succeed in leading Chinese people to establish a modern country. The CPC has effectively transformed its own leadership ability and leadership function into value cohesion efficacy, authority shaping efficacy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efficacy,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modern state building for authority, order and support.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fundamental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leading state building, we believe that the further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ould uphold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CPC to maintain a stable development order; adhere to the organizational reform of the CPC to consolidate its leadership authority; uphold the CPC's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state building; uphold the experiments of the CPC's policy innovation ("experimental points" "proceeding from point to surface") to explore plausible development plans for state building.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te building;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efficacy

[责任编辑:李春明]